

国家“十一五”出版规划重点图书

衣俊卿 主编

启蒙的自反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 与 幽灵式的在场

● 张一兵 著

Hui Chant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国家“十一五”出版规划重点图书

衣俊卿 主编

启蒙的自反 与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 幽灵式的在场

● 张一兵 著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启蒙的自反与幽灵式的在场 / 张一兵著.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07.12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 / 衣俊卿主编)
ISBN 978-7-81129-003-5

I . 启 … II . 张 … III .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IV .
B08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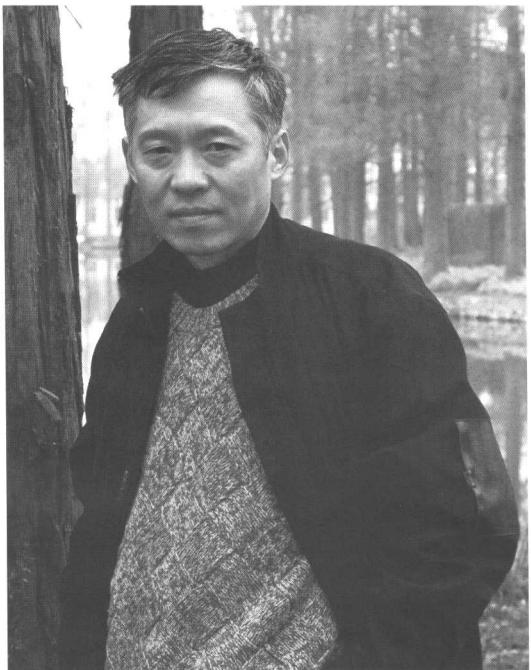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1762 号

丛书策划 李小娟
责任编辑 高山奎
封面设计 咸泽寿
责任校对 董丽洁

启蒙的自反与幽灵式的在场
QIMENG DE ZIFAN YU YOULINGSHI DE ZAICHANG
张一兵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74 号 邮编 150080
电 话 0451-8660866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黑龙江省教育厅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 / 16
印 张 25.375
字 数 390 千
书 号 ISBN 978-7-81129-003-5/B·4
定 价 46.00 元

凡购买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张一兵，男，1956年生于南京。哲学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任南京大学副校长、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江苏省哲学学会会长、江苏省马克思主义学会会长。中央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

总序

1848 年《共产党宣言》正式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人类社会历史进程因此而改变。回顾马克思主义一百多年的历史,有两条大致清晰的线索:一是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推动社会主义在实践中获得巨大发展,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二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一直受到世界思想界的关注和重视。一百多年来,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经历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经历了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无论世界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无论面临着什么样的理论挑战和实践修正,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世界思想界难以回避的强大“磁场”。回顾 20 世纪的历史,不难看出,对于马克思主义全方位的研究,已经成为贯穿整个世纪的现象,并由此形成众多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

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到 60 年代,面临着无产阶级暴力革命观的受挫、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变化,特别是发达工业社会全方位的文化危机,一批有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应运而生:以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布洛赫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赖希等人的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的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差不多与此同时,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社会主义的改革实验为背景,涌现出许多重要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以彼得洛维

2 启蒙的自反与幽灵式的在场

奇、马尔科维奇、弗兰尼茨基等人为代表的南斯拉夫实践派，以赫勒、费赫尔、马尔库什等人为代表的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以沙夫、科拉科夫斯基等人为代表的波兰意识形态批判流派，以科西克和斯维塔克等人为代表的捷克人本主义流派等。

马克思的批判的和实践的学说具有任何其他理论都难以比拟的开放性和历史穿透力。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众多代表人物进入迟暮之年，特别是随着卢卡奇、布洛赫、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萨特等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相继谢世，人们原本以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批判运动即将成为“告一段落”的历史。然而，历史的进程给我们提供了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种新图景：不仅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哈贝马斯、施密特、沙夫、科拉科夫斯基、赫勒、马尔科维奇、弗兰尼茨基、斯托扬诺维奇等人一直活跃到世纪之交，而且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中，一些新兴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从更加多维的视角批判现存社会，出现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解放神学的马克思主义等许多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形成了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更为多样化的格局。

20世纪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重大历史变化又一次对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提出了挑战。一些偏激的人士，如弗朗西斯·福山，基于这些变化，断言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终结，他认为，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成为“历史的终结”。然而，历史进程又一次坚定地展开着自身的逻辑，马克思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并没有因为苏东剧变而减弱，反而有增无减。从1995年到2004年，在巴黎举行了四届“国际马克思大会”，在纽约、伦敦、图宾根、加利福尼亚等地，也相继召开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学术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数从数百人到数千人不等。1999年和2005年，英国广播公司（BBC）在国际互联网上评选“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和“全世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马克思都名列榜首。世纪之交，不仅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多样化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依旧活跃，而且，德里达、杰姆逊等一些重要的思想家也纷纷“走近马克思”，从不同方面阐

释马克思学说的当代价值。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作出的“不能没有马克思”和我们“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的断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马克思学说特有的影响力。

我一直以为，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真正体现了哲学的开放性和批判性本质，他的学说从根本上超越了传统哲学的基本理念，是以对人之生存的本质性的、批判的文化精神的自觉为根基的。马克思学说的内容十分丰富，马克思一生关注的焦点问题也不断变化。然而，无论是其关于经济和政治的分析，还是关于哲学的思考；无论是其关于暴力革命、政党策略、欧洲革命、东方社会特征的分析，还是关于现实经济运行机制的揭示；无论是其关于唯物史观原理的阐释，还是关于从抽象到具体等方法论的探讨，在深层次上都服从于一个最根本的理论关切：推翻和扬弃“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把体现哲学本性的这种文化批判精神奠基在人的实践内质地具有的不断超越、不断扬弃异化的批判本性之上。这正是马克思学说的巨大生命力的根源所在。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为包括海德格尔、萨特、德里达等在内的许多当代思想家所敬重，他的学说的价值绝不会为我们的时代所穷尽。

显而易见，20世纪以来，在人类实践的各种转折和变化中，众多的理论流派一次又一次地“回到马克思”，这正源自马克思学说的这种实践本性和批判精神。我们看到，无论这些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在主题、问题域、范式等方面存在多大差异，无论它们在重新阐释和张扬马克思的思想时存在多少误读和偏差，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像马克思一样，这些新马克思主义流派首要关切的不是理性的逻辑，而是人类的命运；它们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学说基于实践之超越本性的历史性和实践性的文化批判精神，在20世纪的特殊历史条件下针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变化和文化境遇，探寻新的革命变革的思路，以深刻的方式切入20世纪人类生存的焦点问题，开拓出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的新视野。

正因为如此，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有着特殊的实践意义和指向。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从表面看，涉及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研究方法论问题，也涉及在多维视野中对

4 启蒙的自反与幽灵式的在场

于这些理论观点的评价问题,但是,从更深层次来看,中国学术界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关注热情更多地是这些理论的现实“所指”。我们是以折射的方式来理解和把握发达工业社会的发展状况和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或文化批判理论是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危机的直接的理论反思。因此,当代许多中国学者,包括专业人士往往是通过这些新马克思主义流派来深刻理解 20 世纪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人类所面临的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他们对于发达工业社会的许多重大问题,例如,大众文化、技术理性、意识形态、物化和异化、国家和领导权、性格结构、消费社会、文化逻辑、交往机制、生活世界、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信息化、全球化等的认识都不同程度地积淀了国外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种左翼激进思潮的理论资源。

在这种意义上,对于置身于全球化背景中的中国而言,全面了解和深入研究各种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就不仅具有一般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资本主义工业化运动结束了各个孤立的、彼此分离的民族历史,而开辟了“世界历史进程”。工业化与现代性的不断扩展、信息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强有力推进,使世界任何地方的本土问题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同全球问题和世界问题紧密交织在一起。因此,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视野中,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一定是同一个问题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具体说来,在全球化背景中,封闭地探讨中国问题、孤立地描述世界问题、绝对地用世界问题来剪裁中国问题、绝对地强调中国问题的独特性等做法都是十分有害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毫无疑问必须把“中国问题”作为我们的落脚点和聚焦点,但是,决不能孤立地就中国问题而研究中国问题,必须学会从中国的视野去透视世界问题,进而从世界的眼光和全球化的视角去审视中国问题。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与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这些 20 世纪重要的思想理论资源擦肩而过。毫无疑问,在面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众多理论流派时,忽视它们的局限性、失误和理论错误,肯定是错误的理论倾向;然而,不去认真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所提供的的重要启示,

同样是不能容许的褊狭和封闭。令我们十分高兴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 2005 年 11 月 25 日举行的第 26 次集体学习，以“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为题，专门了解了 20 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情况，其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情况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因为，“在西方国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当代流派”。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要瞄准当今世界的学术前沿，着力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提高学术创新能力，努力形成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要求、吸收当代人类文明有益成果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中国学术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翻译成果和理论研究成果。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单独设立，特别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的建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正在成为学术界越来越引人瞩目的学术领域和理论热点。站在新世纪的起点上，回顾过去二十多年中国学术界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进展，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因此，在为政治局第 26 次集体学习就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状况作了讲解之后，我一直考虑以某种方式来推进这种回顾和总结。我们在这里提供给读者的这套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是几位中青年学者过去十几年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心得。在一定意义上这些成果可以比较全面地展示中国学术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状况。当然，我们清楚地意识到，目前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在研究范式、理论评价、推陈出新等方面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存在很多局限性，甚至存在某些理论失误。正因如此，适时地对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作出清醒的、全面的回顾和总结具有特别的意义，将有助于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化。我们有理由期待，在同国外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对话中，我们可以收获更多的理论成果和思想精华。

衣俊卿

2007 年 11 月 15 日

序 言

这是一部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专题性文选，比较完整地收录了近年来我在这个领域中陆续发表的一些论文。

应当感谢这个开放的时代，直接的国际学术交流在过去几年中陡然频繁起来，使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得以从过去那种仅仅停留在文本层面的单方面解读变成了面对面的互动对话。遥迢时空相隔、语言系统迥异，面对跨越这样的远距，历经多手转换之后在手的文本而萌发的不同理论逻辑的碰撞与省思，同直接的学术交流活动里与这批在现实布尔乔亚世界中执著抗争的欧亚左派学者面对面的讨论，感受确实大不相同。必须承认，在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左派学者们的多次直接遭遇当中，我内心对他们所执的态度，不知不觉地发生了一个相当显著的转变，虽然在一些关键性的理论原则上，我的审视和批判态度依旧锐利，然而对他们的文本和思想，我原先抱持的多少有些不由分说意味的对抗、质疑以及批判逐渐变成了更多的理解和宽容。

2001年，德里达在南京大学的讲坛上侃侃而谈后现代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他提到自己意图借由审慎的解构来实现的，并不是批

2 启蒙的自反与幽灵式的在场

评或摧毁哪个模式,自己希望致力的,是思考围绕全球背景下文化之间的这场争论的未来可能性,并呼吁在矛盾中担当责任。这位左派大师如今已经且行且远,然而在那一场讲座里他展示出的批判性思想的锐利锋芒,尤其是谦逊宽宏的学术胸怀令人永远难忘。2003年以来,我们跟日本学界合办的“广松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已经举行了三届,从而得以多次与广松涉夫人深入交流。每每谈及广松涉先生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直接投入了左翼学生运动狂潮的激情,尤其是聊到广松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痴迷和以民族文化为根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轴创立独具东方特色的“广松涉哲学”的艰辛历程,她总是热泪盈眶、情不能已。2005年,卡弗^①访问了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中心,每当谈起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文本,这位严谨的欧洲人认真得近乎固执的治学态度和恭敬于学术的痴迷神情总是深深打动在场的所有人。2006年,雅索普^②在与我们共同主办的“当代资本主义国际研讨会”上被邀致闭幕词,其间他自豪地展示了自己特意早起拍摄的一组清晨的照片,并辅以激情洋溢的抒怀,其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欣赏与热情令与会者尽皆动容。更加令我记忆深刻的是近期造访南京大学的齐泽克。传言中那个风靡全球理论界、时常要“耍大牌”的大胡子齐泽克上个月终于在众人瞩目之下来到南京大学讲学,一上来他就主动要求无偿为本科生多开一场电影专题讲座。为了这堂对他来说完全不在话下的关于好莱坞意识形态的课,这位纯真的斯洛文尼亚人竟然在烈日下满大街去找《卡萨布兰卡》,其实也就是为了在讲座中放两个不到三分钟的片断而已。谈及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齐泽克固然也对这块古老土地上现实与理论中悖结重重的场境忧心忡忡,但却依然热情乐观地期待中国人在未来取得震惊世界的成功。某一次深谈,齐泽克与我提到资本主义全球化中的那一双童真之眼,他说,我们应该为芸芸众生打开一个视界,让人们看到资本的逻辑令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在他看来,这就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批判的质性追问。

① 卡弗(Terrell Carver),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政治学教授,当代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

② 雅索普(Bob Jessop),英国南卡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当代著名的晚期马克思主义学者。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我感佩地发现,在当下这个物欲横流、尊严倒地、良知与责任在冷酷的功利谋算中碾落成泥的历史时际,他们是一群真正值得我们尊敬的、严肃而有公共良知的知识分子。比之于身边一些拼命要得些资本家的实际好处,却又铆足了劲高喊着为布尔乔亚出主意、改政策的口头马克思主义者,再比之于某些天天靠着宣讲马克思主义来换钱、换名、换地位的人来说,这些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左派学者才真地让人肃然起敬。他们的旨趣和追求与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理想一脉相承,在当前这个物质已经极度富足丰裕的资本主义现实里,身处资本主义体制之中,他们依然坚持地秉持知识分子的高尚使命,努力在透视眼前繁华世界中理直气壮的形式平等背后所深藏的无处控诉的不公和血泪,依然理想化地高举着抗拒全球化资本统治逻辑的大旗,发出阵阵出自肺腑、激奋人心的激情呐喊。无法否认,相对于对手的庞大势力而言,他们显得实在弱小,然而正有如传说中美丽的天堂鸟^①一般,时时处处,他们总是那么不屈不挠。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内心的理想是这个世界上最无法征服、也是力量最大的东西,这种不屈不挠的思考和抗争,常常就是燎原之前照亮人心的点点星火。因此,有他们和我们共在,就有人类解放更美好的希望在!

因此,我非常明确地感觉到,这是一群在斯大林主义消解之后,我们能够与之携手前行的学术事业同路人。我逐步意识到,面对这些身处现实资本主义之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左派学者,无论有多少理论认识上的分歧与争鸣,我们都应该与他们展开更多的平等、坦诚、深刻、切身的实质性交流。观点、方法和立场上的异质性,其实并不妨碍一种共同的学术旨趣和理论逻辑平台的建构,相反,这应该是一个大有希望的理论空间!

不过对我来说,与欧洲学者的近距离接触,同时也带来了些许怅然的感受,那个我们心里一直固守的神话式的界划逐渐在消散,即关于经典

^① 传说中的天堂鸟有很多版本。辞书上能查到的天堂鸟是鸟也是一种花。据统计,全世界共有四十余种天堂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就有三十多种。天堂鸟花是一种生有尖尖的利剑的美丽的花。但是我最喜欢的传说,还是作为极乐鸟的天堂鸟,在阿拉伯古代传说中是不死之鸟,相传每隔五六百年就会自焚成灰,由灰中获得重生。

4 启蒙的自反与幽灵式的在场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研究对象的当下在场。在那几场交谈当中，雅索普、齐泽克均不约而同地矢口否认了这个“在者”在欧洲“1968年革命”之后的存在。其实，在今天的法国，能够算得上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除了长寿的高兹以外，其他的大师级人物皆已不在人间，甚至连一批后现代的左派思想家也在陆续离开人世；至于仍然活跃在英美学术舞台上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逻辑上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型，甚至可以说早已不是原来的模样；而德国的情况呢？哈贝马斯在上个世纪60年代之后便已悄然远离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逻辑，在新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霍奈特的文本当中，我们完全找不着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逻辑的质性内容。事实上，我自己不久之前刚刚访问过欧洲，与法兰克福大学副校长和柏林大学副校长的三次谈话都在不断地提醒我，应当直面一个已经发生了的理论事实，即作为马克思主义左派思潮的法兰克福学派正在被当代德国学界逐渐忘却，无法挽回地成为历史。事实上，除了少数学者仍然在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平台上从事思想史研究之外，我们的时代已经很久没有新的具有重大学术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大家出现了。上个世纪90年代末，当我提出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终结时，学界发生了某种理论恐慌，如今想来，这个反应并不奇怪——当一个学科刚刚在国内成为显学，你就公然无情地宣布它的逻辑死亡，这在情感上自然是不容易被接受的。是的，这的确是一种时空上和逻辑上的错位。

其实，当今的绝大多数西方左派学者，皆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投入到对当代“后工业”资本主义现实问题的批判性思考中去了，其中，现代性（工业性）的总体逻辑是一个重要的学术分水岭：这场由本雅明首开先河，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正式发动的对启蒙现代性和工具理性的拒斥和批判，使得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所依存的传统资本逻辑的历史性布展和工业性社会结构成为历史性的追思对象，尤其是这种工业资本逻辑必然生成的总体性和同一性理论结构从此不再成为西方左派学者理论共同体的直接基础。

第一，今天的西方左派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运用，早已经不再采取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语境下对抗斯大林主义的那种本真性证伪的

思路,不再有人如同卢卡奇、阿尔都塞和施密特那样,认为“本真的马克思在我的手中”。当前的晚期马克思主义者和左派学者,即便仍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中生产方式的历史原则,但也都审慎地与马克思保持了一种若即若离的批判性间距;而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思潮则更干脆地直接拒斥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构架,他们只在批判性精神和否定性原则上继承了马克思的理论遗产,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他们果真是将扬弃进行到底了。

第二,所有的西方左派学者,无一例外地都开始直面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或者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指认晚期资本主义和全球化跨国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新特质,或者经由揭露所谓的从工业性资本主义走向“后现代”社会的事实,捕捉其建立在网络信息结构、消费社会、景观社会以及拟真社会的新的统治形式和文化特征——当代西方左派学者所走的路径虽然各异其趣,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中那种试图建构统一社会批判理论模式的总体性努力终究已经风光不再,云烟过眼。

站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图书室的那几幅大相片下面,我沉思良久,一种空寂的历史性在不可避免的落寞中油然而生,紧紧攫住了我的内心;那一趟出访,还去了著名的阿多诺广场,在广场上那个囚禁了阿多诺写字台的大玻璃罩前面也伫立了很久,被遮蔽的文物特征在寥落的人流中扑面而来——有一些事实,已经发生了,并且还在发生着。真的,现在每每与雅索普等人谈到资本主义批判,他们会更关心法国调制学派之后后福特主义和弹性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的最新事实,更愿意讨论网络信息社会情境下的劳动价值论、劳动的国际分工以及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布展,当然还有流动中的霸权。面对齐泽克,一切更加分明,他已经是满口巴第欧和阿甘本的左派政治哲学了,动不动就是他与巴特勒和拉克劳的恩恩怨怨,即便谈及拉康,他都显得十分意兴阑珊。所幸,他仍然热衷于黑格尔、列宁和毛泽东。时光飞逝、世移境易,不管我们如何追怀往日那些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热烈年代,作为一种总体理论思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毕竟已经和正在走入历史经典。

我在想,承认当前新的理论思想现实,与我们同时在更深的层面上耕

6 启蒙的自反与幽灵式的在场

犁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由此再延伸出基于深层思考的专题性研究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冲突,甚至可以说恰恰可能昭示了这一科学的研究视阈在中国的真正展开和深化。尤其重要和没有疑问的是,我们必须充满勇气地直面变化了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和文化现实,寻求对西方左派学者最新观点的全面了解和透彻把握,才能深入推进我们与他们在今天这个历史时际下面对面的对话与交流。

编入本书的,基本上是近年来已经公开发表过的一些论文:第一部分代绪当中,我选入了一篇能够呈现自己学术思想逻辑发展过程的访谈;上编包括几篇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总体评述和一些相关的涉及当代西方哲学背景研究的论文;中编则是我这些年来写下的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研究的文章;下编都是关于后马克思思潮研究的一些新成果;最后,作为代跋的,是刚刚发表的一篇关于构境理论新方法的短文。

过去,我已经出版过两本自己的文集,这一次俊卿兄和刚刚走马上任黑龙江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的小娟又戏称他们是我的“债主”,而此时我恰恰在国外访问,债主们限定“交租”的时间几乎又是夺命性的。无奈,又得借着时差夜夜断眠挑灯。好在主要是编排工作,否则,命真要休矣。不过,固然辛苦,还是要谢谢俊卿、小娟伉俪,此乃心知的真爱。

张一兵

2007年7月4日于新西兰奥克兰

文本解读与哲学创造

——张一兵教授访谈录^{*} (代绪)

访谈时间:2006年7月14日下午

访谈地点: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办公室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研究领域中队伍最庞大、研究实力最雄厚、发表的论著也最多的学科,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几乎没有出现像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已经产生的思想大师,更没有产生多少真正有影响的理论。尽管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对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反思与批判,然而,在我们最新出版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著中,教科书体系的话语方式仍然留着浓重的痕迹。新世纪,中国的哲学研究,当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当真正走向创造而不再仅仅是重复那种“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老路,这几乎是所有哲学工作者的共识。但是,怎样进行哲学创造?从何处起步?由哪里入手等问题还需要哲学工作者进行自觉、认真的思考和探索。张一兵教授创立

* 采访者: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刘景钊研究员。以下采访者简称刘,接受采访者简称张。

2 启蒙的自反与幽灵式的在场

的经典文本解读方式和写作方式突破了传统哲学解释框架,为探索哲学创造之路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他的代表作《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建构深度模式的一个划时代的口号。

——刘景钊

刘:张教授,首先代表《晋阳学刊》主编感谢您能在百忙中接受这次访谈,同时这个感谢还不仅仅是为了访谈。因为,早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我在撰写关于波兰尼的意会知识和内隐认知的论文时就参考并引用过您的《缄默认知:波兰尼意会认知理论的探索》和《波兰尼与个人知识》等论文,借此机会向您表示谢意。因为这个缘由,后来我比较关注您的学术动向。1999 年您出版《回到马克思》一书,不仅在学界引起了巨大震撼,对我本人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早就有拜访您的意思。

张:说到迈克尔·波兰尼,我始终耿耿于怀。由于没有整块的时间,后来就中断了对他的研究,但对他的理论研究状况我一直比较关注。说实在的,如果给我一个稍微完整点的时间段,我可能还会写一本关于波兰尼哲学认识论的书。

刘:这说明,您还怀有波兰尼情结。据我所知,您是国内最早研究波兰尼的学者之一,当时您对他理论的理解和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了。

张:那的确可以说是一种情结,因为我认为波兰尼对我们有太多的启示,他的理论太重要了。

刘:在拜读您的一些论文和著作的过程中,我隐约感觉到,不管是在您提出的“回到马克思”的口号中,还是在您“照着讲”和“接着讲”的实践中,抑或是在您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倾注的精力中都蕴涵着一种哲学创造的激情。我想,大概正是这种创造的激情,促使您能积十几年时间探索并最终形成自己独到的经典文本解读方式和写作方式。您的文本解读方式同您努力追求的哲学创造之间显然有着内在联系,因此这次访谈是不是就围绕文本解读和哲学创造这个话题来进行?看得出,在您发表的众多文本中已经在实践着这种创造,并且也对这种创造进行了理论概括,而我